

## 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挑戰與定位

洪鎌德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 摘要

在 1980 年代女性主義成爲國際關係研究的新課題之一，雖學界著述相當多，但也產生若干誤解，包含以蒐集婦女地位之文獻企圖來提昇婦女的地位，認爲婦女愛好和平與排除暴力，以及凸顯婦女問題會忽略國際關係之議題。女性主義的理論家，對此提出回應，認爲漠視性別的後設敘述，造成上下不平等的統屬關係。此外，此一誤會更彰顯婦女社經地位的低劣與貧窮。其實國關和世界政治是建立在男性與女性相互依存的基礎之上，女性在國際關係中不僅不缺席，還扮演幕後的角色。再者，認同政治也不是男人的專擅，女性在權力運作中並不屈服於宰制之下；相反的，她們在過去的社會運動中也曾以行動表示不滿，例如反對奴隸販賣和男女的不平等。由於忽視婦女的地位，任由男人主宰國政與國關，遂引發貧窮、疾病，乃至於戰爭，而造成婦女經常成爲戰爭、疾病、飢餓的受害者。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之流派，包含自由的女性主義、批判的女性主義、後殖民的女性主義等。全球化加深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對其研究不宜只限於數量分析，還應當採取田野調查等質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收相輔相成之效。

**關鍵詞：**性類與性別、性別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傳統的主流（「男流」）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 壹、前言

最早討論婦女權利和爭取男女平權為英國哲學家歐爾絲敦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而 feminism 一詞也出現在一個世紀之後的 1890 年代。之前自由主義大師的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 1867 年把婦女參政權與選舉權的議題引進英國國會討論，成為後來婦女參政與投票的張本，對婦女政治與社會地位的抬高、貢獻至偉（洪鎌德，2004：393-395）。不過女性主義成為國際關係學說中一個思想與學術的流派則遲到 1980 年代初，幾位傑出的女性政治學者（像 Cynthia Enloe, Jean Bethke Elshtain, V. Spike Peterson, Christiane Sylvester, J. Ann Tickner 等人）之努力與鼓吹，而引發國際關係理論界的矚目。

在 1980 年代之前不僅是關心女權、男女平權的國際理論家從事以女性主義的角度探討寰球政治，這當然和聯合國宣布 1975 至 1985 年度關懷世界婦女的十年之活動有關。許多女性學生、學者大大投入國關學術之研究，完成博士論文，並躋身大專教學生涯的窄門，一時之間美、加、英、德、愛爾蘭和斯坎底那維亞半島的大學校園有婦女研究的團隊出現，而 1988 年《千年》學報（*Millennium*）更有專期討論女性主義與國關理論。接著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國關學界便有婦女專刊，像《符號》（*Sign*）、《婦女研究國際論壇》（*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婦女書籍評論》（*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以及《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等專門性的學報、學刊之刊行。

1990 年代初英國與美國出版社當中幾位女性編輯在獲得出版機構准許與鼓勵之下，開始出版女性理論家的作品，討論的是女性主義與國際關係，其中引人矚目的為英羅綺（Cynthia Enloe）的《香蕉、海濱和基地：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觀》（1989），其他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則有《性別和國際關係》（Grant & Newland, 1991），以及《國際關係中的性別》（Tickner, 1992）等專著問世。

其間國際研究協會中活躍的女性主義者，組織「婦女主張」(Women's Cause)，調查校園中女性教職員有否受到性別歧視的不平等待遇。其次在協會中成立女性主義理論與性別組 (Feminist Theory of Gender and Sex, 簡稱 FTGS)，擴大女性主義理論家的研究、教學與出版之影響力，並一舉在 2004 年加拿大蒙特婁 (Montreal: 舊譯蒙特爾) ISA 年會上大量發表女性主義者之論文 (多達八十一篇)，從而確立國際關係學門中女性主義的理論地位。從此至 2010 年間美、英、加等國際政治課程中「性別與國關」、「國關中的女性主義理論」、「婦女與人權」、「性別與國際發展」、「性別與全球化」、「性別與和戰」紛紛成爲重要的議題與科目。

在 1999 年國際研究學會下的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 (FTGS) 創立了《國際女性主義政治學報》(*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加入撰稿、審稿的學者愈來愈多，讀者群遍及世界各地。此一學報提供一個論壇，俾考察學歷和性別之互動，特別是拋掉學術界的競爭、尊卑、秘密、排他等壞習性，並大力鼓吹年輕學者對女性主義的探究與教學。學報參與者已不限於英語系統的美歐學者，也包括日本、北歐、德、以色列及土耳其。編輯部的結構也是採用全球化的作法，俾新的知識的創新與傳播得以永續經營 (Enloe, 2007: 107-10)。

本文不只敘述近二十餘年來女性國關理論的蓬勃發展，下文進一步解釋女性主義者怎樣針對男性爲主的傳統國關學說作出挑戰，而申明女性主義國關理論存在的必要性之論述。

## 貳、對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之誤解與辯正

由於一開始女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引自不同的觀點、文獻和理念，所以並非一家之言，而成爲眾說紛紜的大雜燴，也是科際整合的典例。與其稱女性主義的國關學說是一個理論，還不如說是大堆「充滿計畫性的作品」，爲進一步理論的型塑，提供參考的線索 (Locher & Prügl, 2001: 115)。就

像 1980 年代雨後春筍出現的批判理論、建構主義、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一樣，女性主義的研究途徑仍舊是對主流派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也抨擊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總之，這是後實證主義的時代，是「對諸種不同理性的強烈回響，包括要承諾採用認識論的多元主義，而且對某些本體論的敏感也要加以承諾」（Tickner, 1997: 619）。這種主張固然與同時期崛起的國際關係中之後現代主義同調，但不可因此否認之前以及之後不少女性主義者使用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方法，以及研究國際政治領導界中女性扮演的角色。這大概是標榜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尋找婦女的定位，認為婦女要克服政治上和經濟上邊緣化的地位，必須對現在政治過程多加參與與多加發聲。

早期自由派強調的是在現實政治中「加入女人，並加以攪拌〔混合女性的聲音，俾引起眾人的回響〕」（Kinella, 2003; Zalewski, 2003）。這種強調卻造成國際研究學界對女性主義的誤解。其中之一為誤會女性主義者在蒐集世界政治中婦女地位的資料，俾增強表述的力量，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歧視。另外一種誤解是認為女性主義者都相信婦女統治的世界是和平的、穩定的，因為女性溫柔敦厚和悲憫照顧的美德得以發揮（Fukuyama, 1998）。再其次，也是第三種的誤會，誤認女性主義突顯「婦女的問題」，而犧牲了國際關係，諸如戰爭、外交樽俎、貿易談判、國際組織、恐怖活動等更具重要性的議題。在這種看法之下，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論力圖避免把寰球的大事瑣屑化、零碎化、細微化，也就是把世人的視野聚焦於婦女瑣碎的細節上。這種對於未涉身外交或經貿的決策之婦女底身邊問題加以敘述，是引發批評家誤解女性主義之處（Sterling-Folker, 2006: 244）。

所有的這些誤解都是忽視女性主義的國際理論產生自不同的理念、學派、論述。它或多或少都會牽涉到研究的對象——國際關係——之內涵、範圍和研究途徑。須知這牽連的有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所滋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在女性主義的陣營中，什麼構成女性？女性有其本質嗎？女性真的比男性更愛好和平嗎？都引發激辯與爭論。很明顯的，女性主義的思

維與理論型塑無法被歸結為簡單的和思辨的特徵，無法把女人參與政治等同為戰爭的結束以及和平的開啓。

女性主義的理論家一開始便區分性的類別（sex：性類、性徵）與性別（gender：男女有別）之不同。前者是生理學上、解剖學上雄與雌性的分類，亦即男人與女人。反之，後者卻是社會上、文化上型塑的男性與女性的不同。是故男的／女的（male/female）同男性的與女性的（masculine/feminine）的區分乃是性類與性別之區分。這成為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不少交叉線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過去視為生物學上的性類、性徵，事實上並不存在普世的「性之類別」（sex）底本質，而是在文化衝擊下所塑造的「性別」、「性向」（gender）而已。

既然性別的角色是社會與文化所建構的，女性主義者一開始便質疑人們是否知道何謂女人？女人的本質是什麼呢？把世上女性的性格當作適合於擔任關懷者、護士的工作是荒謬的（Elam & Wiegman, 1995）。如果女人無法找出其本質，難道男人就有其本質、本性、本體之物嗎？既然人（不論男人還是女人）的特徵、屬性、活動、行為既非天生、自然界和動物學必然出現之物，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男人或女人所生存的文化在何種程度之下，把他或她塑造成男性或女性呢？女性主義者聲稱男與女、男性與女性是相互依存的概念，這種概念建立在男／女和男性／女性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上。女性國關研究者所關懷的不僅僅是女人，而是男性與女性的相互依存。這種依存是社會與文化建構而成，靠著這種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男女之範疇，我們才能瞭解世界、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獲取對世界之認知與經驗）。由是可知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主義，其特徵為有關性別的研究，而非僅僅在研究婦女，同時也在研究由於性別的不同對世界政治所產生的影響與結果。

性別所造成的影響重大，原因是性別乃是一種後設的敘述（meta-narrative）。這種後設敘述建立起一種上下不對等的統屬關係（hierarchy）。在這種垂直不等的關係中，一方（男性）擁有特權、擁有優勢，他方（女

性）無權而又無勢。這種兩元對立又有高低優劣的兩元想法，過去一向被視為正常的、自然的（Peterson & Runyan, 1999: 39-40）。狄珂妮（J. Ann Tickner）甚至指出：「在西方凡涉及權力、自主、理性和公共的事務都被看做陽性的、男性的；與之相反的，脆弱、倚賴、情緒和隱私的場合，則被當作陰性的、女性的」（Tickner, 1996: 455）。

這種對立的，站在反對立場上的性質之描寫並非只是抽象的說詞，而是用來正當化在世界政治中誰該得到什麼，為什麼有所得的基礎。把男性提升、把女性貶抑可以轉換成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結構與流程，用來在環球的規模上產生差別與物化性別嚴重的不平等。世上每三個女人有兩個生活在貧窮中，婦女、女孩便被迫賣淫，而性工業如此猖獗與肆無忌憚，都是重男輕女的觀念之遺毒。同樣地，發展中「落後」的國家之婦女比男人付出更多更大的心力在家務、生計、和顧家的操作上。就是居於世界核心的國家中，同樣性質的工作，同工卻不同酬，婦女的報酬比男性收入少了三分之一。性別的不同之建構乃是規範性、物質性的上下垂直不平等，這也是世界政治與權力的本質所在。把男性與女性社會建構所造成的性別加以解構，女性主義者乃揭露權力的真面目，這個權力是在支撐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環球之佈局、之安排。

由是批評女性主義沒有處理「世局」的真正問題，是令女性主義的理論家大為訝異、震驚的說詞。她們反擊女性主義把事情瑣屑化是基於兩個反證。其一、認為對國際關係有關之議題必須納入既存的範疇。這種主張忘記了概念的界定脫離不了政治與權力，須知概念也罷，範疇也罷，並非完全中立、客觀的（Kinella, 2003: 296）。範疇是一種價值判斷，它反映了特殊的利益和權力的階梯（垂直不平等）。因此，認為國際關係只在研讀國與國之關係、國家利益與安全、經濟權力與國際組織，都是主流派的偏愛與偏見。

其二、傳統標準的國關議題常忽視婦女在該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論是戰爭、還是貿易，其成為可能的事實，背後卻有婦女在支撐。只因為

傳統國關理論把婦女從前台的表演者驅到後台，甚至只變成「背景」、「布景」，婦女變作沒有聲音的人。事實上女人透過其工作、勞務，無時無刻不在國際政治中扮演其角色（外交官的夫人、秘書、生產線上的女工，甚至替第三世界一窮二白的人民送來外匯的女性旅客等等），都是婦女表現的場域與角色，不容小覷。

再說，認同的政治、和平與戰爭牽涉到當事國無分男與女的認同和進行衝突，以及解決衝突的態度與行動，並非只有男性才能決定和戰而已（Elshtain, 1992, 1994）。傳統國關學說不注意日常的政治，包括婦女的犧牲貢獻、認同支持，以及扮演屈服、從屬的角色，是無法抓住政治運作的真髓。要之，種族、階級、族群、國家固然是社會建構的範疇，而成爲主流國關最重要的研討客體，但「性別在結構上並非僅僅是性的實踐〔性遊戲〕所組成，而卻是各種各樣文化中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Peterson & Runyan, 1999: 31）。很遺憾的是傳統國際關係學門，主要的理論家都是男性，也把這個學科男性化，這當然與寰球政治與經濟核心絕大多數是男性菁英在操盤有關。以下討論女性主義對國關與內政核心主題的權力、革命、杯葛與反抗之論述至於有關婦女、小孩，及其他家人的安全、社會與國家的安全，則留在第五節再加以討論。

### 叁、女性主義者論權力、革命與其杯葛活動

女性主義將婦女的理念、行動、經驗、思云言行放在舞台的中心供人檢驗。不但嚴肅地考慮當作女人的女人，也把男人當成男人平等看待。它探索婦女多種多樣，但卻是與男人不平等的地位。它是一串複雜體，企圖瞭解權力的運作、權力怎樣取得正當化、永續化。女性主義者檢查權力是社會與文化建構起來的，常在夫婦、家族、朋輩等「私人」親密的關係中湧現，更會在「公共」的領域（學校、職場、法庭、電視台、廣播界、銀行、工廠、軍營等等）當中展示。至於公私的分別，在公與私領域裡權力的運作更是女性主義者好奇究明的所在。

公私領域中權力的機動彈性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尤其吸收女性主義者的眼光，而引起廣泛的討論。這也是何以女性主義要結合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哲學、生物學、文藝批判、文化研讀種種不同的途徑來探討權力與知識的關係，是故這是多學科、科際整合的學問。

談到權力與性別關係，我們想到中國新興汽車工業，這個被中國人以及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人民視為蓬勃興起的「陽剛」(manly)工業，當然從主管至生產線上的各階員工，絕大多數是男性的，偶然也有女性穿插其間，或至少男性職工之後面有擔當太太身分、或秘書、打掃等工作的女人。那麼進一步要問在工業內、與工業外，這些男性與女性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呢？中國政府工業政策會不會依性別的考察而有不同的處置呢？這種性別對工業以及工業政策影響之結果，或呈現何種的面貌呢？是故表面只在討論中國的新興陽剛工業，其背後則呈現女性主義的國關考察，這是有異於傳統世界政治的看法與作法(Enloe, 2007: 100)。

西方過去兩個世紀中，雖然有女性的抗爭，要求男女平權，但是世局實際的演變，並不回應女性主義的奔走呼號而有太多的改善。換言之，在某些人的操盤下男性的特權仍舊出現、仍舊維持，而絕大多數的婦女仍舊被附屬化、邊緣化。爲了瞭解這種情勢的發展，也爲了改變這種情勢的延續，探討「性別與國關」大有必要。性別分析與女性主義的研究在於瞭解權力以何種形式出現？誰擁有權力？誰要成爲權力行使的對象（甚至犧牲者），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權力如何運作？由誰運作？運作者得到什麼樣的好處？誰被權力唬弄與消音？誰被排除於權力運作之外，甚至遭受壓迫、邊緣化？誰有能力挑戰或抵抗權力的行使？挑戰與抵抗採取什麼方式呢？是故，女性主義的分析需要明示地去進行公共與私人領域的考察，考察權力如何在性別關連下運作。

一如前述英國哲學家，也是女性主義的先驅歐爾絲敦克拉芙特出版了《婦女權利的辯護》(1792)一書，其中曾猛批法國大革命中男性革命者



的父權（長老、家長制）心態。因為當年英法的中產與貴族階級之婦女接受了「理性的男人」和「男人的權利」等等「革命性的理念」，因為只有男人能理性思考與行動，故權利應當賦予男人，不只權利，就是義務和公民身分也歸男人所獨享。與男人相反，女性擁有感情和情緒，只宜擔任妻子與母親的愛撫與安慰的養育與教育工作。在一個宣傳革命，也進行革命的社會中，婦女「自然的」、「天生的」活動空間只限於家庭範圍之間（洪鎌德，2004：392-410）。

不要說法國大革命，英國光榮革命，女人成為革命事業的缺席者，就是其後俄國革命、阿爾及利亞獨立建國運動，1980年代尼加拉瓜桑定斯奪權運動都是男人幹的革命事業，與女人無涉。這種一兩世紀間婦女缺席、不在場（omission）的「事實」有了嚴重的效果。原因是革命被描寫為、評價為和解釋為涉及經濟階級、或具種族、民族的族群之利害關係之改變，而卻忽視或無視男女之間的關係，無視於人群才是國際政治的主角。特別是權力系統的意義之賦予正是建立在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平等之上。這種對婦女參與的看輕、漠視、省略，導致政治分析家把社會運動與政治達標（achievement）描繪為「革命的」、「劃時代的創舉」，當權力的預先存在之體系預留空間，俾供男人獲取特權，而婦女則擺在一邊不加聞問。這種獨厚男人、輕視女性的革命描繪，正是父權制、家長制的特徵，是故難免不受女性主義者的抨擊。

女性主義者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公開的權力、或私底下的權力，其運作、正當化與永續化之目的在於控制婦女的心身，同時也控制所謂的男性性質（masculinity）與女性性質（feminity）。研究的結果指出，吾人如對婦女的生活與條件不覺興趣，則對國際權力的機動、彈性之分析，不但不夠周全，而且所得的成果是錯誤和不可靠的。

舉一個例子，英國學者米潔蕾（C. Midgeley）研究糖業對國際性政治經濟之影響，指出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由於英國婦女積極參與反對奴隸被販賣與役使的運動，因而進行對加勒比安海輸入的砂糖之抵制與杯

葛，使得當時殖民地的甘蔗園無法再使用奴隸工來生產砂糖，輸出國外。由是可知英國家庭拒絕使用砂糖，造成國際杯葛（禁運）成功。他方面禁止奴隸買賣的運動，也刺激英、美國家的婦女，不該權充男性的奴隸，儘管男女結成夫婦是在兩方同意與認可的婚姻制度下完成的（Midgeley, 1993: 475-88）。

## 肆、女性主義者的挑戰

正如前述，自有國際關係這個學門的設置以來，討論的對象主要為各國（特別是強權）之間的外交來往，使節派駐、或商貿往返、文化交流，乃至國際和戰、區域衝突。換言之，這一學門主要的課題為戰爭的原因、衝突的解決、外交的斡旋、國際公法的引用、商貿的擴大等等，而幾乎不涉及世界政治的男女等人群（只提起極少數外交政策制定的菁英，而不談及群眾的活動）。是故女性主義的理論等於打破這種以「國家」、「市場」、「國際體系」為主軸的國關範疇，而指摘把特定時期與地域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之行動者——男與女等群眾——排除於討論之外的不對。是故女性主義就像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後建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成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冷戰結束之後的二十世紀末與廿一世紀初崛起的理論界新學派、新思潮（True, 2001: 231-32）。

女性主義理論家在挑戰主流派國關理論時，指出婦女的生活和經驗不當被排除於國關研究的對象之外。傳統的國關學說「過度地聚焦衝突與無政府狀態，和治國的實踐、策略的型塑，而把焦點放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和害怕之上」（Grant & Newland, 1991: 5）。造成國際體系不斷複製的規範與理念，對暴力結構（貧窮、環境資源分配不公、社會政治地位不等）成為研究國際關係只談戰爭與衝突之外的次要議題。是故主流派的國關理論繼續在為世界政治加以理論性解析，同時在犧牲婦女的問題、性別的議題之外，只聚焦於國際領域的研討，幾乎一兩百年來沒作適當的改變。佔

有世界總人口一半以上的婦女不但從國際的政治商貿活動上失蹤，就是全球化的流程上也沒有她們參與的蹤跡。婦女成爲不受尊重、無從得利的群體，她們總共合起來才擁有世界財產和資源的百分之一，但卻要付出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勞動，而其多數不是難民，便是文盲，便是貧病交迫的受害者。但婦女對家庭、對社群能夠繼續存活做出重大的貢獻。顯然國際過程和互動對男人與女人的影響卻大爲不同。各國政府無能力解決貧窮、污染、核武擴散等重大的國際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之內是由於忽視婦女對社經的貢獻，以及國際救援組織和各國政府未能贏得婦女的支持所引發貧困、疾病、污染處理失敗之緣由。

對於國關研究，女性主義提出另一個挑戰，爲整個學門的概念結構是偏重男性的。國關的重大概念並非全然是以整個人類所形成的類概念（generic），更非韋伯一再強調的客觀中立（*wertfrei; neutral*），國關的基本概念是社會科學與政治學的脈絡下之衍生物，以致「無政府狀態的問題被壓制住」（Pateman, 1986: 5）。女性主義者認爲權力、主權、自主、無政府狀態、安全和分析的層次（個人、國家、國際體系）等等概念是與家長制、長老制，以及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開關連密切。這些概念所認同的是男人，而非女人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形式。因之，國關不只是性別上犯有重大的偏差、歧視，而且是建立在排除婦女的參與之上的一門學問。須知性別是世界建構的看法。以男性爲主體的國關理論像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自稱是描繪與解釋世界之實狀，「認爲世界正是它所呈現的樣子，以致型塑了我們的行動，因之也導致行動者事件的真實世界之具體結果」（Peterson & Runyan, 1999: 3）。就因爲持此看法，使用這類的概念，性別成爲全球垂直尊卑不平等的結構，也造成其他社會認同體（種族、族群、階級）這種上下不平等的關係。如此一來思想活動、理論型塑不過是一項抽象的歷程，其目的在爲號稱客體化的世界命名與賦予意義而已，一點都牽連不到男女群眾安身立命的問題。

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加以觀察，主流派國關理論的失敗是為社會建構起來性別的區分。國家和國際關係有其能力的侷限，無法對世界政治的持續和歷史變遷有所解釋。女性主義者認為西方的兩元思維方式把公共／私人之分、國家／社會之別、內政／國際事務之區隔，來說明國家的形成和「國際社會的膨脹」。在內政上採用家長、父權的立場，然後分別男人主外、女人主內的兩分法，導致婦女被封鎖在家政的無給職與煩瑣小事之上，也造成婦女在政治分析與社會分析方面變成「看不見」的隱身人。就在同一時刻，主權國家的疆界用來分割國內與國外、內政事務與國際事務、本國公民與他國人民。這類有系統的分區與界定（定義）拿來比喻對婦女身體的強暴，無異於對一國領土的完整和認同的強暴，都是男性中心主義、沙文主義觀念的延伸。

把性別與國家的疆域相提並論，便不難知悉把婦女從國內政治與國際事務加以排除所產生的國際關係，變成了男人獨享、壟斷的活動場域，也造成婦女受到男人的宰制。內政與外交論述的分開和新現實學派避談國內相似的情況（男主外、女主內）會造成國家之內以性別為主旨的公私之分別，以及男性把女性聯想為情緒的、主觀性的、繁殖的、肉體的、滿足男人性慾的工具等等，對婦女踐踏、輕視的不當想法。主流派與批判性國關理論都犯著忽視私人範圍的毛病，都認為私人範圍包含女性沈沒於家務的比擬、比喻裡頭（Walker, 1992）。

儘管女性主義者的努力，要把性別之間、性別與內政、性別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係加以理論化，型塑以性別為中心的新理論，但主流派的國關理論仍以個人、國家、國際體系為其分析之單位。這種不同層次的分析方式是用來區分戰爭的類型之解釋，用來組織吾人對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之理解。這點固然有所方便，但狄珂妮卻認為每一分析層次（個人、國家、世界體系）可以再提供重構世界政治關係上的，以及性別敏感的新理論（Tickner, 1992），俾更為深入地探討國關的本質。

## 伍、女性主義者看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一向是傳統主流國際關係研究中最重要議題之一，它是以政治和軍事的角度的去討論國境的防護和領土的完整，亦即避開敵國（或國際環境）對本國及其人民之侵犯。新現實主義者會視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的結構，比起國內的因素對一國安全構成更大的威脅或傷害。因之，國家為贏取安全，應當增強本身的力量（尤其軍力），注意權力的平衡，以免國家安全受到挑戰。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舊蘇聯兩極的核子對抗（所謂「恐怖的平衡」）就是求取安全的手段。1980年代隨著和平研究的崛起，人們關懷南半球的貧窮，環境污染惡化，於是歐洲外交政策的決策者把安全定義為經濟與環境的惡化所引發的國際問題，而不只涉及政治與軍事的糾紛而已。

女性主義者用更廣大的多維度（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多層次（multilevel）的角度來定義安全，目的在減縮各種各樣的暴力形式，諸如形體上、結構上與生態上暴力呈現的樣貌，亦即把各種各類的暴力壓縮到最低的程度，才能稱得起安全，這個新的安全概念與婦女身心平安和性別的注重有關，因為傳統的社會中，婦女受到暴力的侵襲比男性多而久。更何況婦女對各國權力結構都是處在邊緣與弱勢的地位（Tickner, 1992; Peterson & Runyan, 1999）。薛維絲特（Christine Sylvester）認為安全是稍縱即逝、不易掌握的，而且常是部分而非全面性的。它牽涉到對抗的爭執，是一種流程或過程，而非一種理念的狀態。站在婦女的觀點。安全問題發自個人與社區，而非產自國家與國際體系。從邊緣的角度來講求安全，女性主義者認為安全問題，與社會和歷史上呈現的社會垂直不平、上下統屬（統轄與隸屬）之各種表現方式有關。換句話說，位於社會階層上層的婦女，其安全性最高，而社會下層的婦女不但身體的安全堪虞，就是精神和心靈的安全常告闕如。追求安全的過程中人們會揭露社會階梯上不同層次的婦女安全程度，並瞭解人們怎樣去營建安全，以及安全怎樣受到國際秩

序的建構，從而知道安全不是理所當然、自然湧現之物，而是建構與解構的過程（Sylvester, 1994）。

女性主義者認為主流派把安全分為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三個層次來分別討論是不適當的。原因是安全（或不安全）的問題是跨越個人、國家及至國際體系之上。尤其質疑國界的駐守、監視只靠國家的力量便可以安全無虞，這是浮淺的看法。她們質疑軍警有能力妨阻外國的威脅，軍警本身常是正當化、合法化的暴力，用來對付諸個人與婦女。軍人是社會安全網資源競爭的優勝者，在這個安全網上婦女多少要倚賴男人來過活，受男人的保護。軍人也是社會秩序合法化或正當化的手段，俾維持、增大國家的暴力。

一旦分析安全範圍內所涉及的政治與軍事面向時，女性主義理論家便會注意到戰爭結束之後果，而很少留意到戰爭爆發的因由（Pettman, 1996: 87-106）。

自從國際關係的學說在十九世紀末崛起之後，安全問題一直成為國關理論的核心。當然這一問題也為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者所注意，只是女性主義者本身基於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之不同，對何謂安全看法不一。但一般而言，1980年代初受南北對抗、環保意識與歐洲政策制定者看法之影響，大多認為安全不只限於軍事上、國土完整的政治性安全，更要保障經濟上和環境上的安全，女性主義者嫌傳統對安全的定義太狹窄。

多位國關女性主義者以多維度、多面向、多層次的角度來討論安全問題，包括各種形式的暴力之減縮，這包括身體上的、物理上的、結構上的和生態上的暴力之減緩（Tickner, 1992; Peterson & Runyan, 1999）。

正因為女性居於政治權力的邊緣，而女性主義者本身第一個關懷當然是女性的安全。因之，其有關安全的問題之出發為個人與社群，而非國家與國際體系。從邊緣的角度來討論安全，女性主義者以不同的方式討論各個時代、各種地方呈現縱向與橫向的不平等。追求安全勢必揭露這種上下垂直的不平等，包括這種不平等建構了的國際秩序，以及受國際秩序所建

構之一切機制。從而使人們把這種社會不平等滋生的不安全，視為自然（弱肉強食）的觀念加以打破（Tickner, 1997: 624）。

戰爭中受害者最多為平民，在廿世紀初戰爭受害者大約僅佔從事戰爭所涉及的人口總數的 10%，至廿世紀末增加至 90%。其中又以女性、小孩受害最大最多。是故女性主義者在海灣戰爭中極力反對聯合國對伊拉克採取物資禁運，因為在這波物資禁運的杯葛中受害最多的是婦孺，全球 1970 至 1994 年這廿四年軍事衝突中婦孺難民從三百萬暴增至兩千七百萬（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5: 13-14）。英羅綺（Cynthia Enloe）指出波士尼亞戰爭中受強暴的婦女數量驚人，在她看來這絕非突發、個別的事件，而是軍事策略的一環。因為在軍事基地的附近聚集的婦女，很多是被拐誘脅迫來賣淫的（Enloe, 1993: 119）。連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也發生性侵事件，而且還是層出不窮，其上司卻視為年輕男性的輕狂，是男性威武的表現。如此一來維和部隊要扮演維持和平、保障百姓的平安幾乎是緣木求魚，甚至是倩鬼提藥單（Orford, 1996）。

女性主義認為婦女經濟上的不安全是由於家父制、家長制、長老制的社會結構所引起的，這種制度再伴隨種族、階級、族群的中介，使得婦女不是陷身家管，便是進入低收入的職場，既談不到同工同酬，也無經濟上獨立或安全可言。再說，公私的分開，使婦女在家操勞既無報酬可言，婦女也沒有自主權，也沒有經濟上的安全。因之，婦女在社會上、經濟上居於低微的地位，並非單單靠市場供需的運作所造成，還因為向來的觀念，認為婦女適合擔任教學、養育、護理等符合其「天性」的工作（Peterson & Runyan, 1999: 37; Pettman, 1996: 165-168）。此外，大堆的女人擠在低報酬的工廠，或隱身於家庭繁雜瑣屑的家務上，有很大的成分上迫使婦女「認命」，認同這種傳統家族與社會賦予的「女性角色」，視此為「自然的」、「天生的」、「命運的」安排，而不是採用理性選擇的模型去思考（Nussbaum & Glover, 1995: 91）。換言之，社會對女性扮演的角色之期待強化男女的不平等，也惡化婦女的安全。

上述討論好像在強調婦女的角色，而遠離國際關係的討論。不過女性主義由下而上，與主流派由上而下不同方式的討論國際大事，正反映了全球的經濟操作與國家努力追求富強與好處，完全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礎之上。這種不平等對婦女的安全與不安全起了重大的作用。事實上是在犧牲婦女的安全與福祉之上，大談世界與全球經濟。很明顯能夠吸引外國財團來本國開發、投資的發展中（新興）的工業國家，常是在役使國內大批未婚，而低報酬的女工之上，更可悲的是視大批低工資的女性工作者為馴服而不知反抗的綿羊，她們在家中還不能看做是「賺錢養家的支柱」（breadwinners）（Enloe, 1990: 151-176）。當國家被迫減少國庫支出，而採用結構性調整計畫時，婦女傳統上的角色就是關懷、就是照顧一家大小，於是在領不到國家的任何報酬之下，扮演了家庭福利的職責，原因是女性在家中工作沒有酬勞是社會或國家結構性調整計畫下，增強經濟效力的良方（Moser, 1989）。

女性主義者在對國家之作爲加以檢驗時，會發現男女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幾乎是每個國家立國的基礎，但這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卻影響國家對外追求安全的行爲，而這種國家的行爲也受本國社會關係的塑造。把國家視爲性別所建構的事物（制度），對瞭解追求安全的企圖有所關連，可以進一步去瞭解何人、何者（當然絕大部分是男性、上流的男性、有權勢的男性）的利益得到照顧、得到增強。把支持戰爭和「自然化」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加以照明、凸顯，對瞭解戰爭與社會結構的原因相當有助。女性主義者認爲國家的性別基礎和市場的性別基礎都該一一暴露和加以挑戰，這樣婦女真正的、廣義的安全（人身、職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上的安全）才可望塑造和建立（Tickner, 1997: 626-28）。

## 陸、女性主義的流派

女性主義的派別繁多，也不乏單打獨鬥的個人理論。我們在這裡僅指出比較受人注意的幾個流派，包括自由派、批判派、後殖民主義派等等。茲分別敘述如下：



## 一、自由派的女性主義

查列芙絲姬(Marysia Zalewski)指出在國關學說中理論有多層的用途，可當作分析現象的工具，可以當作批判的手段，可以當成平日生活的經驗。在知識的傳統中這三種用途都可以發揮，偏偏自由派的女性主義卻被邊緣化(Zalewski, 2003: 291-294)。自由派的女性主義發現傳統國關研究的主觀性，靠的是「尋求那些無聲」(silences)，被壓制而噤聲，以及加上「從來不被聽到的聲音」(unheard voices)，是故女性主義之方法為「強調談話與對話，而不是只懂產生單一的、勝利般的真理」(Charlesworth, 1999: 379)。

對國關這個學門，自由派的女性主義所採取批判的貢獻在於方法學和深沈的規範性批評。女性主義理論高峰在於方法，其特徵則為批判，它具有本質上的意義，而非徒具形式而已。女性主義的方法是從一個假設出發，從一個再簡單不過的詞彙出發，而凝結在這樣的結論之下，亦即女人的處境非常的不公不平，而亟需改善、補正(Bartlett, 1999: 34)。這種方法應用到國關之上，就應該使學界回應婦女的想法與要求，也應該反映她們的生活經驗，而改變、轉型她們的生活，俾大家承認女人是個特別的行動者，享有平等的待遇，其目的在矯正不成比例的男女權力關係(Slaughter & Ratner, 1999: 46)。

自由派引用自由主義者的理論，強調個人的權利，法治的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性的機制，俾個人的權益受到保護、照顧與增強。其出發點為個人身分的經驗，因之，敘述、脈絡的思考和多種觀點(multiperspectivity)非常重要。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與政治乃為對人性、個人是行動者，以及同一般自由派的理論家所強調的人是理性動物之看法相一致(Donnelly, 1999: 81)。這一理論是根植於經典的自由哲學，包括洛克、盧梭、邊沁、穆勒對平等、個人主義、自由與正義的討論與演展(Andermah, et al., 1997: 123)。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進步」一詞非常重要，自由派思想家均認為人類走向理性的能力會不斷地、進步地展開，他們相信任何的爭論都應循

合理的辯解來尋求答案。是故自由派女性主義者也主張任何國際關係，包括爭端、衝突、戰爭都應當透過正義的普世律則公平處理、和平解決。除此之外，尚討論人性是善、是惡、是合作的、還是競爭的；國家與社會應當保持何種的關係；在何種情況下一國可以干涉他國，為的是維持國際秩序，遵守國際規範；社群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如何平衡；自由與容忍的程度；資本主義的市場與自由貿易對爭取公平與和平所扮演的角色。

自由的思想使得女性主義者各取所需，而呈現不同的兩派。不過有一項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又採取共同的立場，那就是男女的平權要靠法律貫徹的個人權利之體系來達成（Vincent, 1986: 152）。這是自由主義激進或基進的勢力，使女人可以伸張其權利的基礎。婦女應有權、或被賦予權力（empowered：授權）成為法律的主體，國家有義務承認婦女這種權利而回應其要求。

個人權利的理念有必要承認個人是行動者與認同體，亦即承認在社群、團體（家庭、社會、國家）中擁有其本身分開的存在之權利（Donnelly, 1999: 81）。必須注意的是自由派在承認個人擁有這些權利之同時，也應尊重社群（團體）的權利，個人的幸福繫於社群的和諧。是故個人必須注重社群的責任與義務。婦女個人權利的認同與執行在很大程度上繫於社群（Cahill, 1980: 284）。是故讓婦女不要從國際舞台失蹤、或看不見，這些要求的受到重視成為當務之急。其次，要確定婦女存在於世上，然後啓開婦女對自己以及對世局的認識。在分析世事時不時「加入婦女」的經驗和意見，把從上向下的研究途徑改為由下而上的看法，目的在顛覆不合理的宰制／附屬之關係。最後採取轉型的方法（認識論、方法論、實踐學上的行動），不只解釋世界，也要改變世界（Mertus, 2006: 252-57）。

## 二、批判性的女性主義

有異於主流派現實主義者視國關為強調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爭霸，或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者對世局的視線放在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家、

非政府的群體（國際特赦組織、跨國公司等）所進行競爭，以及國際社群不斷的演變，女性主義主張國關的分析之第一部為活生生的、能呼吸、有血有肉的人群：亦即究竟是哪些人群在「製造」、「經營」國際關係呢？批判性的女性主義者指出，傳統的、主流的國際關係在回答上述問題時，其答案早已蘊含了性向、性別（gendered）。對現實主義者而言，成為國關中操盤手，如果不是政治人物（包括政客、野心家），便是指揮士兵將官、或資本家、企業家。對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者而言，操縱國際大局的人除了國家的領袖與士兵之外，還多了外交官和跨國公司的經理，以及國際組織的官員。佔據上述官署、機構、商團的權勢人物絕大多數為男人。是故國關的景象乃為高速路邊的警示語：「男人在工作中」（Man at Work），請各位駕駛小心！這表示性別所製造的決斷，正是全球各處擁有權勢者之傑作，也是造成世局如此這般演展的主力。不說別的，在 1985 至 1995 年之間發生在崩潰的南斯拉夫土地上因為塞爾維亞進侵波士尼亞，使科索沃一地區有七萬五千人流離失所。因為這場種族屠殺的悲劇所引發婦女的悲苦慘痛，使批判的女性主義者質問什麼原因、行為和結果，導致這種具有性別的衝突（gendered conflict）？女性主義者進一步質問是什麼「歧異的向度、維度（界面、面向）」（dimension of difference），包括種族、族群、男女、職別造成這種權力關係（宰制與奴役）？而這種權力關係及其衍生的決定（決斷）又造成巴爾幹半島這個後冷戰時代的人民，尤其婦孺要去承擔其結果——喪失家園、親人，遭逢殺戮、強姦、流亡、悲痛的人間煉獄（D'Amico, 2006: 269-81）。

很明顯地，國關的研讀本質上就是對權力的考察，以致現實派大師莫根陶（Hans Morgenthau, 1904-79）<sup>1</sup> 直言國際政治乃為諸族國對權力的爭取（struggle for power among nations）。可是傳統學人很狹窄地界定權力，把它當成國家的軍事力量，有時則為軍事力量加上經濟實力的國力（洪鎌

<sup>1</sup> 譯為「摩根索」乃為錯誤的英語音譯，須知此人為德裔美國學者。莫根陶的德文原意為「晨露」。本文作者在 1970 年代初於慕尼黑大學曾與他長談請益。

德，1977：135-61）。傳統與主流派只關心誰在行使權力，以及怎樣行使權力。批判的女性主義者則把權力的維持與擴大，不僅涉及國際，更影響了人際、影響男女的關係。她們進一步考察權力怎樣取得、如何運作、怎樣喪失。她們還追問權力的結構怎樣形成、對誰有利、對誰傷害。為達此目標批判理論者使用各種分析的工具與技巧，包括使用解構和論述的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她們質問這場戰役為誰而戰？戰爭的規則由誰來訂定？誰是戰爭當事國的「公民」？人們使用何種的語文——選擇怎樣的字句、遣詞用字——來討論、或講述權力？是不是藉口民族主義？還是中國人所言「和平崛起」？愛國主義？「血濃於水」的大漢沙文主義？除此之外，什麼叫做干涉、干預？為什麼使用這些字眼，而避免其他的字眼？這些詞句、詞彙所蘊含的是什麼意義？什麼語重心長（significance）？這些用字遣詞所要激發的想像、連想是什麼呢？很明顯地，批判的女性主義的分析使用的批判理論之工具，俾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別之上，因為性別正是在國際關係中權力分配的組織原則。這裡的批判理論並不限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文化與批判社會學，是廣義的後實證主義的國關方面之批判理論（洪鎌德，2010）。

與自由派女性主義視婦女為原子化、自主的個人不同，批判的女性主義在行經高速公路看到警示牌「男人在工作中」之餘，還要進一步質問「婦女在那裡？」這個問題表面上仍舊是自由派的疑問，但不要忘记權力「貫穿（滲透）所有的國際關係，此時在忽視婦女的存在，婦女在國際政治的景觀上之存在，會造成錯誤觀念的永續化，誤認為權力關係只是某種風格趣味與文化之事物。反之，對婦女嚴肅的注視可以暴露多少權力的獲取在於維持現在形式的國際體系」（Enloe, 2004: 2-3, 7）。是故批判理論強調權力的性別天地（維度）是何等廣大、何等深邃。這表示自由派要求在國關中加入婦女於現存權力結構之上。反之，批判理論暴露這些權力結構中有多少概念的基礎，而要求把這個基礎解除、打碎（解構）。

批判女性主義的觀點在於擴大性別的感受（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因而，不僅質問「女人在那裡？」還進一步質問：「是那些婦女？那一類婦女？」以此觀點來觀察，國際關係是一連串權力的上下垂直不平等（power hierarchies），其建構、其維持都在圖利少數居高位者，而不利於社會金字塔塔基的廣大群眾，尤其是婦女大眾。這種上下垂直的不平等就是上文所提的「歧異之維度（天地）」，婦女正好是一天到晚喊著「找出不同」（make a difference）的社會中，那些不同的異類（不同於男性的「他者」、「異者」）。這種說詞的背後，隱藏誰應獲得好評、高價，誰會遭受貶抑、低估。在每個社會中歧異的維度以多種多層的面貌呈現。人群在某一社會網絡的定點上獲得特權、優勢（例如在兩性之間男人佔上風），但在另一網絡據點失權、失勢（例如黑人在服務業中，比較多擔任低級、報酬少的工作）。以科索沃的戰亂為例，塞爾維亞男人擁有政治大權，阿爾巴尼亞男人（滯留前南斯拉夫境內之阿爾巴尼亞人）則被排除於權力大門之外。性別與族群合在一起可使塞爾維亞女人免於遭受同族男人的性侵，但卻顯示另一族群（阿爾巴尼亞婦女）遭受強姦的厄運與噩夢。

批判女性主義的觀點使吾人瞭解男人與女人的經驗歧異和看出社會內或社會之間整個權力網絡，不僅有性別的差異，還有階級、種族、族群的紛歧。在考慮到科索沃的衝突時，女性主義者的疑問是性別的概念和歧異的維度（向度、天地）如何被動員起來，俾增加吾人對這一種族廝殺、滅種的衝突有所瞭解。這些概念如何建構社群的認同與政治的策略。科索沃的男人與女人的敘述怎樣被國際媒體與政策制訂者所描繪而呈現其影（意、形）像？我們看到那種的男人與女人？他（她）們的經驗是如何的？他（她）們所講的故事（經驗實況）有那些被聽到？那些不為人知？這些意像和特殊的作為（議程、課程 agenda）怎樣贏取國際（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盟等）的回應與干預？科索沃社會如何重建？瞭解到性別概念與差異維度對科索沃局勢的型塑是否提供吾人「教訓」，而可以應用到世界其他地區的衝突，以及提供給有關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派兵干涉之啓示（D'Amico, 2006: 268-70）？

### 三、後殖民主義的女性主義

後殖民的女性主義聚焦在有色婦女（白色以外各種顏色的婦女）如何受到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的帝國主義之意識形態和實踐之壓迫。它常引用馬克思主義（馬派）的女性主義之說詞在性別的不平等之外，不要忘記階級的對立、敵恃和鬥爭。不只馬派重視階級之對立，就是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也強調家長（家父、長老）制與資本主義的互動之勾結，這也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知識論所顯示不同。事實上馬派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不同之處，除了前者重視階級鬥爭之外，還由於後者把經濟力量擺在舞台的正面，然後透露資本主義和性別（男性）的家長制之間的互動對婦女在職場與家裡均極不利（Peterson & Runyan, 1999: 28）。不管是馬派還是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都是激進的女性主義。激進的女性主義要求女性擁有自主權，要拒斥男性所界定的規範與制度。它本身轉過頭來影響後殖民的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認為婦女遭受壓迫的根源就是男人對女人身體的宰制，這是「性徵政治」（politics of sexuality）之高峰，是故「激進女性主義無意與男性完全平等，假使這裡所指的平等為〔性事〕方面變成了像男人那樣具侵略性與壓迫性的話」（Peterson & Runyan, 1999: 165-70; 洪鎌德, 2004: 410-58）。除了馬派、社會主義派、後現代派的女性主義之外，也可以再加上心理（精神）分析派的女性主義，它解剖下意識之裡所造成性別的角色（Gilligen, 1982）。

女性主義最獨特之處在強調女性的認識、感受、體驗是特殊的，是故女性的認識論不但與男性不同，且能把被邊緣化的人群的經驗更為照明、更為顯露。其原因為外人與遭驅逐、排斥之人的觀點或立場比較容易產生更為客觀的知識。這比起權勢集團靠近宰制的制度與概念架構而不知民瘼、不知真實狀況要好得多（Tickner, 1996: 456）。

而所有邊緣人無過於後殖民的婦女。這方面闡釋最有力的人為出生在加爾各答，而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印度女學者史匹娃珂（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她主攻的是英、美和印度的文學，但卻深受

法國思想家德希達的影響、討論的有文學批評、文化政治、後殖民主義。其主要的著作《後殖民理性的批判：走向喪失現時的歷史》一書（Spivak, 1999），析述新殖民世界中流亡菁英的多元文化論。對她而言，國關理論並不在爭論何者是客觀與合理，而是強調表述（representation）的問題。九一一事件不僅涉及文明的衝突，更為南北貧富的對抗。事實上自廿一世紀開頭至今十年間成為寰球政治與世界經濟的課題，還有認同的衝突、跨越（國界）的國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以及流亡與散落的政治（diaspora politics）。她勸學者從寰球化研讀轉向後殖民主義的評析（Spivak, 2002: 127）。

史匹娃珂最關心的是南半球（第三世界）不幸的婦女被排除於國關探討之外。她相信女性的認同體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事物，靠著社會制度硬行塑造出來。她與 Renajit Guha 在印度歷史學會中成立附屬者（次要者）研究小組（Subaltern Studies），強調印度貧苦的勞工與農民對印度獨立運動有重大的貢獻，偏偏印度獨立運動史卻是英國殖民政權、或是反英的印度菁英所撰寫的，而忘記了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都捲入印度資本主義統治的制度化過程。她強調後殖民主義的研究中不可少掉性別的考察。她尤其忿忿不平的是支持丈夫抗英的印度婦女被排除獨立運動正史的敘述之外。史女士的倫理目標在使身為附屬者與次要者的婦女之聲音有機會被聽到。唯有其聲音被聽到，才會覺醒團結，知所反抗。後殖民的知識份子要協助身陷附屬地位的婦女去掉其所屬次等公民之心態，而學習如何去批判後殖民主義之論述。事實上，性別議題在後殖民主義的概念運作中容易被忽視、被省略。這項議題也不限於追求獨立自主的印度女性，可以擴大至全球婦女。是故把附屬者、次要者、低階者之問題列入批判性的國關理論是大有必要。因為嶄新的、批判性的國關理論一定要關懷全球、種族、性別和後殖民的關係。她的真知灼見創造本土與在地的女性之全球意識，用以破解各地對婦女壓迫的種種制度與結構（Kimvall, 2009: 317-18）。

## 柒、女性主義的議題

儘管女性主義有不同的流派，對各種議題也分別以其所屬流派的觀點來加以析論，但我們仍舊看出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強調性別在國際事務上的重要性，但偏偏這個重要性卻被主流（其實在女性國關理論家心目中並非主流〔mainstream〕而已，還可以說是「男流」〔malestream〕，或跡近「亂流」〔maelstrom「漩渦」的傳統說詞〕）派所忽視、漠視、無視。是故女性主義者特別把三項相互關連的現象拿來加以分析：

其一、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裡，國家與市場都被性別化、男性化，其假設與結構都採用雄性、剛性與男性的觀點。

其二、在男性主宰的詞彙下，政治的與經濟的行動、作為（agency）之主要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都忽略、無視婦女的實在、實狀（realities），以及她們對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貢獻。

其三、對於性別作為分析的範疇不加注意、不加關懷會導致男女認同與角色彼此關聯之社會建構的混亂（Youngs, 2004: 76）。

是故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指責以男性為主（男流）的國關理論變成一種論述，旨在永遠地混淆、曲解世界觀，或不斷在製造偏差的世界觀，俾便利男人對權力的控制和優勢的挾持得以擴大與延續，而犧牲了婦孺或其他無權無勢的男人的整體社會實在、社會事實。在此情形下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對歷史上業已建立的男性之權勢做了反思的、批判的、挑戰的論述。它是對向來的、全民的政治與經濟的流程所做公開與全面的探討，這是聲討有權有勢的男性之論述。當然它也會檢驗權力怎樣運作，包括受性別化、種族化、族群化的人群，怎樣在社經政文各方面受到歧視、壓迫，或個人與群落在不同層次，享有權勢、自由、能力發揮或是其各項權利受到壓制、剝奪之諸種不同的情況。

因之，女性國關理論者之主要職責為一方面是解構的、他方面是重新（再）建構的，透過對主流派研究途徑中以男性為主體的有限性之批判，



而揭露對性別待遇之不公，以及打破男女從事的政治與經濟流程與結果上性別造成的限制。是故婦女與性別是導致權力結構與分配不公平的主因，而權力問題不只限於男女之間，也是人際的、國際的關係所形成的核心，所有政治與經濟的過程，無非圍繞著權力的爭取、維持和擴大之上在打轉。學者在不同的觀點下，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權力與性別之關係，但這種關係卻為主流派所忽略。其原是因為主流派完全以男性為主體建構的實在，只注意到其外表，而不肯深入其實質。由此所建立的有關國際政治之知識是膚淺的、表面的。女性主義國關理論者要求對本體論加以修正，認為有必要深入外表之後，去探討歧異化的權力和性別化的權力如何來建構社會關係，這種建構的關係形成了社會的實在。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時男性多在控制政治與經濟，究其原因都是性別不平等造成。這就導致主流派國關理論家視為國際政治是男性主導的現象，而不肯進一步探索這表象形成更為深層的實質意義。為了打破這種迷思和虛像，英羅綺等開路先鋒便在 1980 年代末討論戰爭黷武主義（軍事擴充主義）和安全問題，而指出這些概念（戰爭、黷武、安全）都具陽剛、男性的意涵。因為這些國際間的活動是以男性保護者、征服者、剝削者的姿態來演活其戲碼（男人以戰士的身分參與東征西討）。是故在表面上的保家衛國之美名下，征戰、反抗、衝突求取本國的安全之戲碼，便由好戰的男士演出，而女性的溫柔敦厚便與這類國際衝突或和解搭不上關係，婦女成為這場國際武力競爭的隱形人、看不見的人物。

事實上「性別使世界開動」(Enloe, 1990: 1) 確實把主流派、男流派的國關理論從內部翻到外部、加以顛覆。因為國關是男性的界定、賦予定義，也是男性型塑的。這種情勢並不因為 1990 年代以及 2008 年美國總統任命女性擔任國務卿，而讓女人擔當國家外交重任而有所改變。原因是絕大部分美國的外交與軍事政策都是男性制定與執行的。

至於把國家當成是「男人的國家」(manly state) 主要在描述國家的陽剛之性，以及諸國家男性 (manliness) 之普遍條件（例如國家實際上是男

人在主持和推動政務、在決定國家的走向)，也是男性（masculinity）和男性主體性所呈現的問題（Hooper, 2001）。當主流派人士視國家大體上為男性控制圓融的政治單位（國際體系中的行動者）之際，女性主義卻在重估它性別化的實在所滋生的種種意涵。國家表達的「公共超越私人」的垂直不平等（婚姻契約決定男尊女卑、男主外〔公共領域〕女主內〔家庭管理〕）這種上下不等的架構不只型塑政治關係，更型塑經濟關係（男人賺錢養家、女人撫養子女、提供男人「無料的」性服務）。換言之，公共領域是男性發揮才能的場域，家庭無給職的操勞則交給婦女去拼搏。

國家的形成與取得認同體之歷史乃是性別化壓迫的歷史。「自亞理士多德以來國家政治權威的有效集中，累積過程的結果，使性別與階級的壓榨制度化，也把這種變遷加以意識形態化」。「亞氏甚至稱男人為『主人』（主體），而女人為『物質』（客體），從而把男人剝削女人、剝削其他男人（奴隸）與剝削自然這三樁大事去除政治化，加以自然化」（Peterson, 1992: 14）。

至於全球化與性別的關聯之研讀，也要考察全球化的重新結構的衝擊，不只加重男人與女人的不平等，更製造男人與男人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重大差異，更不用提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之擴大。全球化所牽涉的關鍵性問題為生產的超越國界、（體力、瑣屑性）勞動的婦女化，後殖民社會的重新建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資訊業與服務業的膨脹，包括國內服務業與「性工作」服務業之劇增，移民大量增加（包括欠缺專業者擔任服侍、照顧老病之看護工、或從事繁重體力的粗工），被迫賣淫的娼妓業之發達、福利國的衰微，以及福利短少對婦女的衝擊極大，婦女的權利更遭受貶抑（Peters & Wolper, 1995）。

## 捌、女性主義國關理論的研究方法

就像主流派的國關理論，女性主義的國際政治學說也採用質和量的研究方法。在質方面，一方面熟讀各種國關理論的文獻，而進行文本閱讀、

解析和批判，尤其是德希達的解構方法被多數女性主義者所採用。福科的系譜學、考古學偶然被用上，但主要在他所強調「論述」(*discours*)的分析。儘管與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一樣對主流派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與科學主義大加批判，但經驗主義中的田野調查與實地訪談，也是質性研究之部分、不可或缺的研究途徑，為女性主義者所樂意運用，像有關波士尼亞內戰、或種族衝突中，對科索沃婦女的訪談敘述作為筆錄，並加以分析，可見經驗性的訪談法是彰顯婦女在國內與國際衝突中實際體驗或感受的反映 (Mertus, 2006: 253-54, 258-67)。

數量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與女性主義並非彼此互相排斥。就算是女性主義的數量研究方法，也會注意社會正義的問題之上，特別是當它涉及婦女所要求的公平、正義之際。但令人驚異的是不少女性主義的國關學者卻排斥這種數量的、經驗性的研究之途徑。須知經驗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探查並沒有衝突。經驗主義可以支持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活躍份子之活動 (Dietz-Utne, 1985)。女性主義者常在兩個基礎上被定義為其特徵：其一強調是婦女，其二主張批判的兼解釋的認識論 (Carpenter, 2003: ft n 1)。

何以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者拒絕使用數量的統計與分析呢？是不是由於一般的國際關係之學說中數量的研究法獲得廣泛的應用，而女性主義者因為反對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遂把洗澡盆中的嬰孩連髒水一起倒掉呢？還是國關中的女性主義者覺得使用質性的分析更為安穩妥善呢？

事實上，國關理論中充滿太多以男性為中心、以國家為中心的偏見，以致狄珂妮說「在無政府狀態中的國際體系中，多數國家所構成的世界，保留太小空間來分析社會關係，包括了性別的關係」(Tickner, 2001: 146)。這種說法無意塑造一個稻草人來當成批鬥的對象，也無意模仿唐吉訶德要對抗風車。因為傳統的國關學說裡派系眾多，使用的方法互異，不當皂白不分、打成一體。須知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體系的看法已趨向式微，不僅使用政治學，更應當採用社會關係來解釋國家行為的學說逐漸浮現。

更何況追求民主的和平之規範性解釋強調的是人權在社會層次上的價值，也支持法治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則強調傳統或主流的國關學說只重男性、只注意國際，而忽視人際，尤其是不關懷女性，顯非持平的看法。

傳統的女性主義者犯了很大的毛病，就是製造兩元思考。其一為女性主義的方法論對抗主流的數量研究法；其二、傳統的女性國關理論者，自認為其方法是正確的；反之，那些注重方法論（特別是數量方法）的國關研究者是作繭自縛、劃地自限；其三、傳統女性主義者受著日常習慣的影響，也誤認為數量分析的優越，而不知以解構的方式理解數量分析只是種種可用的研究途徑之一。這正是研究者受其理論的架構、期待、經驗、使用的語文所囚禁，而不肯同其他的典範之遵守者進行溝通之緣故（Neufeld, 1995: 44）。幾位著名的女性主義的國關學者就犯了柏波爾所說「架構的迷思」（Myth of Framework），包括狄珂妮（Tickner, 1996, 2001）、裴德慎（Peterson, 2002）、施甜絲（Steans, 2003）等人。她們都犯了這些偏頗（Caprioli, 2004: 256）。

其實數量的分析對女性主義的理論不但無害，反而帶來極大的好處，因為它建立一套知識，可以給女性的研究、安全問題的考察，包括調查以色列、埃及、巴勒斯坦和科威特的人民，而發現性別對戰爭與和平不同的看法（Tessler & Warriner, 1997; Tessler, *et al.*, 1999）。有關國家行動之計量分析（Marshall & Ramsey, 1999）。其他涉及國內性別不平等對國家處理國際危機之影響（Caprioli & Boyer, 2001）。

上述量化的研究有助於吾人瞭解性別平等對國家行為的預測。對婦女的歧視、虐待和暴力會大大影響國家的政策走向。總之，國際關係數量的研究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Caprioli, 2004: 263）：

- （1）學者有關性類（sex）和對待國際衝突的態度之意見調查，有助於女性主義的理論的營構和增加經驗分析的需求。
- （2）性別（gender）平等的規範聯繫到對待國際衝突的態度之上。性別（gender）平等的規範比性類（sex）更可以預測國家的行為。

- (3) 性別的權力增加（授權增大）減少國家在國際上使用武力。
- (4) 性別平等限制了國與國爭論時暴力的激增。
- (5) 性別平等在危機發生時減少暴力的嚴重性。
- (6) 性別平等會減少國與國發生爭執時動武的可能性。
- (7) 性別平等減少國與國使用暴力的機會。
- (8) 婦女愈能進入政治權力核心，愈減少國際爭執時動武或爆發戰爭之可能性。
- (9) 安全的規範不注意性別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挑明政策對民主、人權、婦女權益的影響重大。
- (10) 婦女與男人使用不同的談判方式，因之在潛勢力之下導向不同的外交政策之後果。

## 玖、結論

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最主要的關懷是國內與國際的政經結構中，婦女的聲音很少被聽到，這是種因於傳統西方與東方社會重男輕女，女性被當成男人的洩慾工具，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內外分開、公私分開的家長制，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是一切罪過之根源。是故性別平等的要求，不限於一國之內的婦女之要求而應擴大至全球佔有總人口半數以上的婦女之要求。婦女身處邊緣地帶，而很少進入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決策或執行之核心，也引起女性國關理論者嚴重的關懷。

對於身處邊緣者，以及「歧異的維度」(dimension of differences，包括種族、族群、階級身分之分歧、差異與不平等)之弱勢者加以關心與注目，可以掃除權力（政權）出於鎗口，或出於世界各國領袖的嘴裡之錯誤說法。女性主義者對權力的解構與重構，固然有其真知灼見，但權力的浮濫擴散、無孔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肆虐，也是造成不平均、不平等（上下垂直的主從關係）之世界秩序的主因，這是女性主義低估權力

瀰漫性、淹沒性的本質之所在。是故反對主流派國關學說只重國家中心說，而無力預測舊蘇聯一夕之間的崩潰，是所有後實證主義的國關理論（包括批判理論、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特別是女性主義）對主流國關說之批判，也是它們貢獻之所在。

不過，讓女性和婦女在世界政治上嶄露頭角，雖是女性主義的貢獻之一，它還要指出至今為止人類社會的歷史、結構、知識（特別是涉及國關的知識）都是帶性別的標誌，受男女性別不同與差別待遇所型塑的。因之，國關研究這個學門無論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或實踐學（praxeology）上都需女性主義者全神投入，俾揭發主流派的學說大多建立在男性為中心、國家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甚至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的層次之上。很多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者遂在解構或顛覆「現實主義」（realism）以及「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因為以這兩者來解釋後冷戰世局是不恰當的。

女性主義者把性別當作是世界政治一個重大的變數（variable），是建構性的理論之因素，也是改變國際關係的一個元素，無疑地補充傳統主流（男流）國關理論的缺失。女性主義認為男流的國關學說對人群有關「國際的」、「關係的」知識有曲解與誤導之處。這包括誤把權力視為凌駕「他者」、「異者」的優勢，誤把「自主」視為對「他主」的一種關係，它是關係的，而非性質的（是過程的，而非結果的、非狀態的）。在這種情形下主流（男流）派視國關是男人之事，也是婦女缺席、不在場的國家之間的競爭。國際關係是在否定內政，或把內政擱置一旁的國與國之間的车拼、權鬥、奪勝。它們把性格與婦女消失影蹤，是因為無視國內與國際體系中把公共與私人領域一分為二，並加以制度化的結果。這種忽視婦女對國與國之間的和戰、交往的作用，就無法瞭解世界秩序和世局走向。

在很多研究的事例中看出，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揭露寰球權力及其轉變不只是政治與經濟菁英的操弄，而是受到無數世界各地婦女、邊緣人、弱勢族群的柔順、馴服、聽命、不思抵抗所造成。一旦這群沈默的羔羊有

意識而知團結、有所行動時，世局必然有了重大的突破。眾所周知 1999 年 11 月「西雅圖之戰役」，各國婦女領袖集聚美國瀕臨太平洋的大城舉行集會、示威、遊行，而抵制世界商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開會，就是女性國關理論者把理論付諸實踐的顯例。

## 參考文獻

- 洪鎌德，1977。《世界政治新論》。台北：牧童出版社。
- 洪鎌德，2004。《當代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事業。
- 洪鎌德，2010。〈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6卷，3期，頁1-30。
- Andermah, Sonya, Terry Lovell, and Carol Wolkowitz. 1997. *A Concise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Arnold.
- Barlett, Katharine T. 1999. "Cracking Foundations as Feminist Method."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and the Law*, Vol. 8, No. 1, pp. 31-50.
- Cahill, Lisa Sowle. 1980. "Towards a Christian Theory of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8, pp. 277-301.
- Caprioli, Mary. 2004. "Feminist IR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pp. 253-69.
- Caprioli, Mary, and Mark A. Boyer. 2001. "Gender, Vio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pp. 505-518.
- Carpenter, R. Charlie. 2003. "Stirring Gender into the Mainstream: Constructivism, Feminism, and the Uses of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2, pp. 287-302.
- Charlesworth, Hilary. 1999. "Feminist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No. 2, pp. 379-94.
- D'Amico, Francine. 2006. "Critical Feminism: Deconstructing Gender, Nationalism, and War," in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ed.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68-81. Boulder: Lynne Rienner.
- Dietz-Utne, Mary. 1985. "Citizenship with a Feminist Face: The Problem with Maternal Thinking." *Political Theory*, Vol. 13, No. 1, pp. 19-35.
- Donnelly, Jack.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Tim Dunne, and Nicholas J. Wheller, ed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pp. 77-1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am, Diane, and Robyn Wiegman. 1995. *Feminism beside Itself*. London: Routledge.
- Elshtain, Jean B. 1992. "Sovereignty, Identity, Sacrifice," in V. Spike Peterson, ed.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Theories*, pp. 141-54. Boulder: Lynne Rienner.



- Elshtain, Jean B. 1994. *Women and Wa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Enloe, Cynthia. 1990.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nloe, Cynthia. 1993.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nloe, Cynthia. 2004. *The Curious Feminist: Searching for Women in a New Ag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nloe, Cynthia. 2007. "Feminism," in Martin Griffith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pp. 99-110. London: Routledge.
- Fukuyama, Francis. 1998.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pp. 24-40.
-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Rebecca, and Kathleen Newland. 1991.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ooper, Charlotte. 2001.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mvall, Catarina. 200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Jenny Edkin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eds. *Critical Theoris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7-29. London: Routledge.
- Kinella, Hellen M. 2003. "For a Careful Reading: The Conservatism of Gender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 No. 2, pp. 294-97.
- Locher, Birgit, and Elisabeth Prügl. 2001. "Feminism and Constructivism: Worlds Apart or Sharing the Middle Grou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5, No. 1, pp. 111-30.
- Marshall, Monty, and Donna Ramsey. 1999. "Gender Empower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tates to Use Force." (<http://www.systemicpeace.org/CSPpaper2.pdf>) (2010/10/29)
- Mertus, Julie. 2006. "Liberal Feminism: Local Narratives in a Gendered Context," in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ed.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52-67. Boulder: Lynne Rienner.
- Midgeley, Clare. 1993. "Anti-Slavery and Femin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Gender and History*, Vol. 5, No. 3, pp. 475-88.

- Moser, Caroline O. N. 1989.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7, No. 11: 1799-1825.
- Neufeld, Mark A. 1995.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artha, and Jonathan Glover. 1995.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ford, Anne. 1996.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Security."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2, pp. 373-409.
- Pateman, Carole. 1986. "Introduction," in Carole Pateman, and Elizabeth Grass, eds. *Feminist Challeng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p. 1-12. Sydney: Allen & Unwin.
- Peters, Julie, and Andrea Wolper. 1995. *Women's Right: Human Righ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 Peterson, V. Spike. 2002. "On the Cut(ting) Edge," in P. Harvey Frank,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148-63.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 Peterson, V. Spike. 1992. *Gendered States: (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 Peterson, V. Spike, and Anne Sisson Runyan. 1999. *Global Gender Issues*, 2<sup>nd</sup> ed. Boulder: Westview.
- Pettman, Jam Jindy. 1996. *Worlding Women: A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Slaughter, Anne-Marie, and Steven R. Ratner. 1999. "The Method Is the Messag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No. 2, pp. 410-24.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9. *A Critical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s a History of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2002.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Decline of the Modern St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No. 1, pp. 127-49.
- Steans, Jill. 2003. "Engaging from the Margins: Feminist Encounters with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pp. 428-54.
- Sterling-Folker, Jennifer. 2006.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 Sylvester, Christine. 1994.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ssler, Mark, and Ina Warriner. 1997. "Gender, Femi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49, pp. 250-28.
- Tessler, Mark, Jodi Nachtwey, and Audra Grant. 1999. "Further Tests of the Women and Peace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3, pp. 519-31.
- Tickner, J. Ann. 1992.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ickner, J. Ann. 199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t-Positivist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446-6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ckner, J. Ann. 1997.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pp. 611-32.
- Tickner, J. Ann. 2001. *Gendering World Politics: Issues and Approache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rue, Jacqui. 2001. "Femin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231-75. Houndmills: Palgrave.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99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ncent, R. J. 1986.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R. B. J. 1992. "Gender and Critiqu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V. Spike Peterson, ed.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Re)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79-225. Boulder: Lynne Rienner.
- Youngs, Gillian. 2004.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Or: Why Women and Gender are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e' L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1, pp. 75-87.
- Zalewski, Marysia. 2003. "'Women's Trouble' Again in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2, pp. 291-94.

# Contention and Affirmation of Feminism in IR Theory

Lien-Te Hung

*Concurre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feminist challenge of the male-dominant, mainstream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and global economy. The feminist worldview contests the sole legitimacy of conventional “male-stream” theory within IR scholarship. The feminists appeal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ians of both sex,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blems of power, interest, secu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s well as other IR relevant issues. This treatise then briefly discusses the various schools of liberal, critical and postcolonial feminism. Since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re considered unique and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of research, the essay finally touches on them in brief. In conclusion feminists’ attempts to assert their position within the IR scholarship and their original and novel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orld affairs are positively evaluated.

**Keywords:** Gender and sex, IR of gender inequality, feminist IR theory, “male-stream” IR theor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